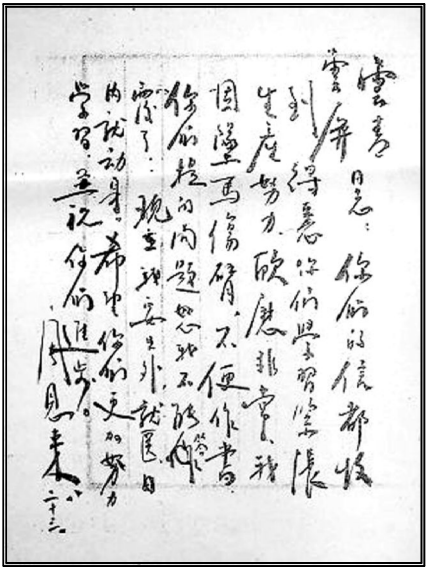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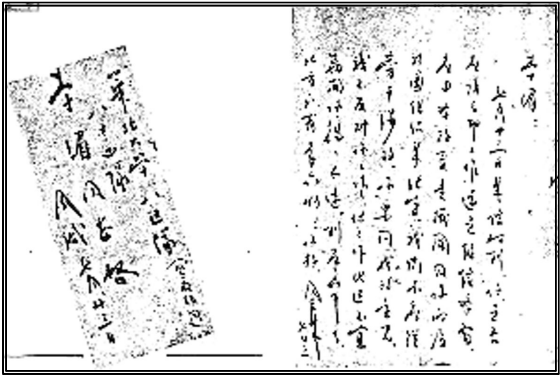
# 为了永远的怀念：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 一生函复七八百件 周恩来如何对待群众来信

王香平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给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的复信



一九四九年周恩来给李少石烈士之女李涓的复信

周恩来对青年人的成长总是热情扶持、关怀备至，他曾多次给革命烈士子女复信。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加强和促进新政权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并接受群众的监督，我们党逐步创立并形成了信访制度。1951年6月7日，经周恩来签署，政务院(即国务院前身)正式颁发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其中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周恩来一生函复人民群众来

信多达七八百件，尽管数量庞大，问题各异，但其共同的主题都是对人民利益和群众疾苦的关怀与重视。可以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热情接待，负责处理”这八个字的内涵。

### 悉心关怀教育方，甘为青年孺子牛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周恩来对青年人的成长总是热情扶持，关怀备至。

1938年初，安徽省寿县的曹云屏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曹渊1924年入党，1926年9月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革命烈士已长眠地下，如何培养遗孤成才，周恩来认为党组织责无旁贷。他当即提笔复信：“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贫苦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来洋贰拾元，藉作来汉路费。”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曹云屏于1938年5月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青青。

1939年，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云屏、青青想请周恩来谈谈有关抗战的前途问题，遂致信询问。当时，恰逢周

恩来骑马坠地受伤，右臂骨折。在伤势严重、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痛回复：“得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为了帮助云屏兄弟认清革命形势和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在工作繁忙、右臂受伤的情况下还坚持复信，不仅让云屏兄弟感动异常，也坚定了他们为革命事业而奋力拼搏的决心和意志。

周恩来对待革命青年无微不至，满腔热忱，可谓“俯首甘为孺子牛”。但他对青年人的工作学习则不迁就，不袒护，而是严格要求，悉心教导。

1949年7月23日，在华北大学学习的李涓(廖仲恺的外孙女、廖梦醒的女儿)，在毕业前夕致信周恩来，要求参加南下工作团，到群众中去，并希望得到周的支持。周恩来这样复信：“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我们不应从旁干涉”，“北方也有群众啊”，如此委婉中肯的措辞表达，既是对青年人错误的认识和观念及时纠偏、为其拨正人生的正确航向，同时也彰显了周恩来秉公无私、一视同仁的为政风范与领导品格。

### 为民解难戒拖延，小处着手大处谋

早在1951年5月16日，针对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1951年1-3月处理人民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毛泽东郑重作出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来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处理群众来信尤其是

涉及民生疾苦的问题，都容不得任何疏忽大意、粗枝大叶，表现出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首先是处理来信迅速及时。周恩来处理群众来信，不少都是在接信当天就予以回复。如前面提到的给曹云屏的第一次复信，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8年3月19日接“来信”，“本日复信”；给李涓的复信，据《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记载，李涓来信和周恩来复信均在“1949年7月23日”。这体现了周恩来对待群众来信当机立断、能办速办、绝不拖沓的工作作风。

其次是设定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周恩来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批给相关部门、地方或具体责任人给予处理，但他绝不是一批了事，而是要求汇报处理情况，并对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这就杜绝了有些人敷衍塞责、虚与委蛇的可能。比如，1952年1月18日，针对上海一名群众反映供给制难以养家糊口，要求实行薪金制的来信，周恩来批示：“当令人事、财政两部限五天内定出办法送批。”1968年8月27日，针对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一事作出批示，要求当地驻军“本月底”派人“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从27日到本月底，调查解决问题限定在4天之内。再如，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将一贯把人民来信当成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处理得当，就会事半功倍。1971年3月16日，针对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夫人郑洁贞请求赴美定居的来信，周恩来批道：“可以同意，并赠旅费及生活费。”如此简洁明了的批复，既满足了当事人的正当

要求，解决了问题，又根据来信人的特殊身份，予以特殊对待(“赠旅费及生活费”)，这对来信人而言无疑是意外的惊喜，自然也有助于增进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感情。寥寥数言，却情谊饱满，足以让人倍感无限温暖和关怀，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细致周全的处事之道和高人一筹的领导谋略。

### 一竿到底究落实，对官僚做派不姑息

广大群众给党委和政府写信，尤其是直接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除了感谢信、表扬信，更多的还是反映问题，有的甚至是伸冤诉苦。之所以会存在大量这样的信件，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部门或基层政府不负责、不作为，其根源就在官僚主义作风。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从20个方面作了形象刻画，包括“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等等。

周恩来深知“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同这种“病症”作斗争，也就成为他必须正视和面对的工作内容。

“文革”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给国务院来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外宾时铺张浪费，同时讲自己因负伤回北京家中养病，但治病亦有困难等。国务院将此信转到相关部门。该部门相关责任人却办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代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回国务院了。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地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亲自指示该部同志去找这位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他。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官僚主义根深蒂固。即便是作为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很多情况下，周恩来也得多次催促、问询甚至追逼，事情才能得以落实。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就李葆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妻子田映黄来信要求将李从关押处放出住院治疗事，打电话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要求立即将李放出。3天后，周恩来再次电话催问。又过了2天，直到25日，李才最终获释。

人民群众找政府，说明对政府抱着信任和期待，如果掉以轻心或粗枝大叶，不仅直接伤害了群众的感情，也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鉴于此，1973年7月24日，周恩来对公安部一件有关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确有困难者，应予以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此外，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一竿子到底”这种做法，在让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同时，也的确可以让官僚做派无处藏身，无处躲闪，敢于同官僚做派作斗争，才能做到对群众利益真正负责，相反，如果纵容姑息官僚作风，就是对人民疾苦和权利的蔑视或践踏。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论在党内外，还是海内外，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根本上，归因于他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炽热的群众情怀。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启人深思的话：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 周恩来与商务印书馆工人

任其祥 谢庆斋 蒋钟麟 薛兆圣 孙诗圃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周恩来同志曾长期在这里工作，领导过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我们商务印书馆的老工人，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值此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的时候，回忆起他同我们工人并肩战斗的情景，引起我们对他不尽的怀念和崇敬。

1926年5月1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蒋钟麟和谢庆斋均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广州。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他在会议期间特地安排了一个日程，约各地代表参观军校。当代表们到达军校时，周恩来同志已在校门欢迎。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代表们返回原地要防止反革命的阴谋，要团结广大群众打倒军阀。响应北伐军，迎接北伐胜利。会后，他又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军校，还作了详细介绍，使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周恩来同志年仅28岁，这次接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同志秘密来到上海，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第一次来商务印书馆工会之时，由章郁庵同志通知商务发行所职工会的谢庆斋，嘱他先到商务印刷所通知工会迎候。当周恩来同志由赵世炎、章郁庵两同志陪同到达工会时，见到谢庆斋、蒋钟麟，未经介绍就说：我们相识，在广州见过面。他的记忆力之强，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次他和陈云、徐梅坤同志来到商务工会，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他详细询问了商务工会在前两次工人起义中斗争的情形。他在讲话

中指出：我们工人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去发动群众，组织训练好既有军事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工人纠察队。有了坚强的工人纠察队，就可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要联合上海全市民打倒反动军阀，建立民主的市政府。在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表现出伟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周恩来同志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商务工人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活动都加强了。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善战敢斗的坚强队伍。

### 三

由于当时形势动荡不安，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数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组成了闸北保卫团第三辅助团，征求商务工人参加。工会对工人要不要参加这问题讨论了好几次，意见难以统一。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来参加会议，会中提及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意见纷纷。有的认为这是资本家搞的组织，不愿为资本家卖命效劳；有的认为即使参加了也不愿去训练。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认真听完了大家发言，很风趣地问大家：“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望着他。他耐心地说：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就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以商量的口吻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听了他讲的道理，心明眼亮，一致同意他的主张。党员和工会骨干的意见统一了，工会就遵照他的指示动员工人

去参加保卫团。周恩来同志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同志来担任商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辅导工作，使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劲旅。

### 四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周恩来同志曾多次由赵世炎、陈云、章郁庵、徐梅坤等同志分别陪同到商务工会，部署起义的准备事项。在形势极端恶劣的严重情况下，有一次他竟亲自坐了汽车送两箱枪支和弹药到商务印书馆工会，一箱给商务工人纠察队，另一箱还要送往指挥部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当他来到商务工会时，商务工会正在开会，见到他亲自送枪支来，大家都感到不安，因为近几天来，宝山路已成危险地带，但又不好意思对他直说。接待他的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很机灵地说：我们正在开重要会议，有些问题很难作出决定，您来得正好，就请您一起参加会议吧。周恩来同志也觉察到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忧，就微笑着说：兵法上不是说要出其不意吗？谁相信青天白日坐着汽车的阔老板肯冒风险送军火。大刀队不是眼看着我坐的汽车驶而来也不问吗？你们的会议要我参加，我很高兴。于是大家把他留下来，另一箱枪支派任其祥代他坐了原车送往指挥部的另一个集中点，交给吴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负责而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的勇敢精神，使我们敬佩不已。他常对我们说：干革命嘛，总要冒点风险，可是胆要大，心要细，否则就干不了革命大事。他的一言一行深刻地影响着商务工人，商务工人纠察队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奋勇作战，一举夺取了五区警察署，而且包围并攻下了东方图书馆的敌人据点，胜利完成了周恩来同志原定的战斗计划。在纠察队攻破这两个据点后，他又命令商务纠

察队派出一个中队赶赴北火车站，参加围攻直鲁驻军的战斗。当日晚上，宝山路文德里、义品里一带，突然遭受敌军磅礴弹炮击，四周一片火海。他又急令商务印书馆消防队开赴现场，扑灭大火。他还指示商务工会救护队不仅要抢救纠察队的受伤队员，并且对遭到流弹袭击受伤的市民也要及时抢救。经过28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纠察队终于击溃了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鲁联军。

### 五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周恩来同志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些同志作了撤退的安排。他嘱任其祥首先把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迅速转移。王景云被安排去宝山县的南翔暂居。我们八九个商务工人分别去湖南、武汉等地。其中，薛兆圣、蒋钟麟到武汉后，出席了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陈公庆和蒋钟麟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印刷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武汉的任其祥到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工作；王春生担任了苏、浙、皖三省避难同志招待所主任；杨贤江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马日事变”后，武汉的形势也日益恶化。周恩来同志就及时地动员各八九来武汉的同志迅速各返原地，以待时机。他说武汉已受到许克祥、夏斗寅的威胁，反革命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假若同志们继续留在武汉岂不成了“瓮中之鳖”。于是蒋钟麟、薛兆圣在他的动员下，绕道从芜湖、高淳、溧阳一路转常州等地回上海。

我们回忆这些往事，深切怀念周恩来同志。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他和我们并肩战斗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他的教诲是我们永远铭记不忘的。

(王敏良整理)

## 大鸾仗义斥无赖

——记少年周恩来在家乡的一段往事

樊国栋

我十岁那年，随母亲去大羔皮巷嫡堂外祖父吕幼臣老先生家走亲戚。外公见我个子蹿高了，不禁回忆起他像我这么大时，曾与小名叫大鸾的少年周恩来玩耍过的经历。在他的讲述中，大鸾嫉恶如仇、勇斥无赖的一幕，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1907—1908年间，大鸾的生母、嗣母相继去世，使家庭生活陡然发生变化，父亲料理完丧事，经别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时年十岁的大鸾，领着两个弟弟，从清江浦陈家花园回到淮安城内驸马巷家八婶母身边。身穿紫红长袍的大鸾，经常与附近小孩结伴游勾湖宝塔根，登城中心的镇淮楼，爬院门口的石狮。还应他们之请，讲述西游记故事、清江浦见闻。

大鸾经常和小伙伴登镇淮楼看大孩子放风筝，放鸽子，他追随着渐渐远去的鸽影时，常常会陷入无限的遐想之中。

在数次谈美中，大鸾都听说一个十六七岁的阔少无赖经常欺负小孩，夺走玩具，混走零钱。这一次，眼前的这位小伙伴所心爱的铜制玩具“九连环”又被阔少无赖讹去，大鸾气极了。在众小孩期盼的眼光中，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一种责任，他追问了一些细节，随小孩们来到土地祠门口。

那无赖果然又出现了，大家远远地指认着。大鸾终于认清他一副德性样：骨瘦如柴，两腮无肉，谁都猜得着，这是偷吃大烟的特有“尊容”。也许烟瘾又发作缺钱钱买大烟，阔少无赖一到市口，便缠住近旁一小孩，正在哄骗零钱。大鸾又一次被激恼了，在小孩子们簇拥下，涨红着小脸蛋，走到比他高一头的无赖跟前，举起手来，要狠抽这少年中的败类——记耳光，可一瞅到那干柴般瘦弱的身子，又不忍心下手了。这无赖的烟瘾似乎被大鸾的这一气势惊吓跑了，下意识打着趑趄后退几步，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怒不可遏的大鸾厉声喝道：

“你凭什么混人家的钱？又凭什么讹小孩玩具，夺人之爱？”荒废学业多日的无赖对“夺人之爱”这个词儿感觉很新鲜，虽从未经说过，可又似乎听懂其中意思，还隐约体会到是在谴责自己，也在谴责自己的父母，觉得来人还不饶他，他早把来人的个头、年龄忘了，顿时软了下来，目瞪口呆，还上一句嘴。

一群孩子包括刚才那个小孩，也七嘴八舌，纷纷向阔少无赖索要钱与玩具。无赖进退两难，大鸾缓下口气说：“小弟们有‘玩意东西’，换着玩是可以的，理当玩过再换回。为什么一定要讹赖人家东西？明儿把讹去的东西都带过来，还有那件九连环，统统带过来，物归原主！”

没等大鸾说完，那无赖自知理亏，只好点头称是，悻悻退出人圈。

路过的行人敬意油然而生，向众小孩打听大鸾了：这是谁家孩子？这么有出息！

好长一段时间，那无赖再也不敢来土地祠市口神气活现了。大鸾土地祠斥责无赖的事，终于被家里的八婶知道了。八婶长长叹了口气，怕少不经事的侄儿引来更大的麻烦，约上蒋妈一起把大鸾带到岳庙东街的姨外婆(嗣母陈氏的姨母)龚家探亲，商讨让孩子上学读书的事。因为龚家办有家塾，希望能接纳大鸾到那里读书。

姨表舅激励大鸾发愤攻读，矢志成为报效中华的栋梁之才。

思想进步的姨表舅龚荫森，当时正一门心思追随孙中山，常年在奔走，难得那天在家，与亲家的婶侄相遇。他听了土地祠市口那件事的叙述，非常感动，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嫉恶如仇是非常可贵的品格，但毕竟岁数太小，不能急于成事；如果冲动之下真的一巴掌下去，有很大的冒险性，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为将来的社会公平，发愤读书，趁着年轻，抓紧学习知识本领。并主动提出到自己家寄宿就读的设想。于是，大鸾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在表舅家，大鸾还有机会接触许多宣传近代科学与新思想的进步书刊，他似乎看到了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潮流滚滚而来，视野豁然开阔了。

(作者为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